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澳〕尼克·奈特著　王应一摘译

译者按 此文摘译自科林·麦克赖斯和尼克·奈特编《马克思主义在亚洲》(伦敦和悉尼克鲁姆·赫尔姆公司 1985 年出版)。作者尼克·奈特当时任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亚洲研究学院讲师,专门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政治"。此文旨在阐明毛泽东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开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重大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走过曲折的道路,既有重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又有严重失误,忽略了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还发动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该加以科学分析,区分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尼克·奈特这篇文章,在"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评价极高,注意到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上的预见和远见,但缺乏全面分析,没有看到其失误的一面。此文反映出国外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供参考。

在许多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看来,延安时期(1936—1947)标志着毛泽东在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生涯中达到了顶峰。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撰写了许多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也正是在这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期，毛解决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①。诚然，延安时期，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在50—60年代，毛力图制定另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就之大与上述贡献相比，如果说没有超过也是毫不逊色的。在这方面，毛是航行在一条基本上未曾探测过的航道上。他所寻求的发展战略同苏联模式迥异，而50年代初，中国所沿用的正是这种模式。毛后来逐渐感到苏联模式基本上不适合中国国情，对它有了清醒的认识，这就促使毛去寻找一种同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和需要相适合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提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管当代中国人对它作何评价），应当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的一个极为重大的贡献，因为这条道路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提出了一种不受苏联模式束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发展战略。

本文将对50—60年代组成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要素加以分析，重点讲一讲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60年代晚期的“文化”大革命。

1956年两件大事

回首往事可以清楚地看出，1956年是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毛的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分水岭。构成这一分水岭的因素是什么？

一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中国农民积极响应合作化的号召和这一运动的成功，使毛获得为探索另一种经济战略所需要的政治上的回旋余地②。中国农民积极响应合作化的号召，同苏

①例如，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在理论和实践上最伟大的成就”。见《毛泽东》（企鹅图书公司，1966年版）第68页。

②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联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苏联那时(还常常带有很大的暴力)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在毛看来,既然农民能够积极地响应号召,就有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所创新,采取不同于苏联的战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二是 1956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非斯大林化的报告。赫鲁晓夫在尖锐地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对斯大林确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加以攻击。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主义机械的历史发展观点,那种观点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一条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有任何偏离。赫鲁赫夫认为,虽然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各国可以有不同的过渡方式。赫鲁晓夫强调的不是一律如此,而是过渡形式的多样性。

毛泽东也许是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比赫鲁晓夫清楚得多地看到苏联领导人拙劣地处理斯大林问题所引起的后果。1958 年,毛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时说:

> 1956 年批斯大林,我们一方面高兴,但另一方面担心。完全需要揭开盖子,破除迷信,消除压力,解放思想,但我们不同意把他一棍子打死[①]。

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仍然存在着矛盾,苏联非斯大林化促使他更加清晰地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述。1936年斯大林曾断言,社会主义在苏联实现后,俄国人民内部的

①施拉姆:《未加修饰的毛泽东》(企鹅图书公司 1974 年版)第 101 页。

矛盾便“消失”了[①]。毛不同意这个分析。在《矛盾论》中,毛反对斯大林关于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消失”的观点。毛指出:“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②] 毛泽东同斯大林的分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明白:

> 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③]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有的矛盾作了分析。在《论十大关系》(1956 年 4 月 25 日)一文中,毛指出,若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处理矛盾,就可以避免在制定和贯彻政策时发生错误,言外之意是,斯大林未能看到和正确地处理俄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因而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毛详细论述了中国在经济上的几个矛盾,并以相反相成的观点一一提出解决办法。要解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矛盾,发展重工业,就必须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这同苏联的实践有重大不同,苏联一贯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作用,而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希望中国内地工业有更大发展的人,毛则要求他们集中利用并进一步发展沿海地区工业。对于要求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人,正确的作法则是削减军事开支,增加经济建设投资。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毛认为,增加对于生产者个人的报酬,给予生产单位以更大的自主权,会有利于全国实现工业化。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毛要求将全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为此而需要给予地方以更大的自主权,使之具有主动性。

①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
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1974 年版第 282 页。
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1974 年版第 282 页。

毛泽东还注意到中国的其他矛盾。其中也许以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最为重要。毛强调需要学习其他国家（不仅仅是苏联）的长处，不要采取妄自尊大的态度，因为这可能使中国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应如何结合其政治背景理解《论十大关系》的意义？第一，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内部的主要矛盾，毛为未来制定切合中国特点(而不是搬用外国模式)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毛希望通过这种分析防止滥用权力。斯大林曾因错误地认为苏联内部的各种矛盾已经“消失”，在所有政策问题上都会全体一致而导致滥有权力。在毛看来，由于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以独断专行的办法强求全体一致和整齐划一，就会使社会陷于一种会产生严重缺陷和消极后果的发展模式。第三，毛以相反相成的办法解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说明他力图说服中国的经济计划人员，按照他的设想改变经济发展的方针，仍然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不像苏联那样地强调重工业反而会收到加强重工业的效果。

因此，毛泽东是根据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来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乃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有矛盾并非坏事，因为正是矛盾的不断出现、发展和解决推动社会的前进，没有矛盾，就不可能有变革和发展，而没有变革和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

强调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矛盾，这是 50 年代末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有矛盾就需要承认矛盾，并加以揭露和解决。否认或压制矛盾，就会使矛盾发展到具有对抗性，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是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的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旨。《矛盾论》将对抗和矛盾加以区分,毛根据这种区分指出应当区别两种不同范畴的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非对抗性矛盾可用和平方式处理，对抗性矛盾则需要靠暴力和镇压加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虽属非对抗性，但必须正确处理，不然就有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危险。匈牙利事件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始终面临着这种危险。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承认，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不过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但需要注意正确处理，以免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为避免矛盾发展到对抗，毛泽东认为必须创造一个比较开放的气氛，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并展开争论，以便暴露和解决矛盾。这也是毛决定中共开门整风的原因之一。1956 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 年 5 月开门整风，毛原想“和风细雨”地进行整风，但后来却出现了一场新的五四运动，对党的批评劈头盖脑而来，言辞激烈，怒气冲冲，同时在学生中还发生了相当广泛的骚乱。到 6 月份第一周，整风便一变而成为一场反右派斗争。这证明的确像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诸多矛盾，而且其中一些矛盾具有对抗性，需要由人民专政机构加以解决。

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尽管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毛泽东并不认为它可以不受批评。恰恰相反，党必须定期进行整风，以免蜕化变质，丧失革命作风，放弃革命目标。

“不 断 革 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更远的将来始终存在着矛盾，这是他形成“不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不断革命”的概念是说，1949 年的胜利并不表明中国革命的结束。中国在为现代化和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各种新的矛盾(新的要求，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这种不断出现的矛

盾,要求继续保持革命热情。夺取政权并未结束斗争,应当将社会主义建设看作革命的一个阶段，革命要继续下去，直至遥远的未来。

1958 年 1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概念：

>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 1949 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就搞高级社。七年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①。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斗争不能够停顿。这一观点还涉及毛对未来历史发展的看法。达到共产主义以后是否还要继续革命？毛关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论必然会使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出现矛盾,也还会有革命斗争(不过不是阶级斗争)：

>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②。

① 施拉姆：《未加修饰的毛泽东》第 9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1977 年版第 318—319 页。

在别的地方,毛泽东还曾断言,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会不断地发生“先进的技术和落后的技术之间的斗争”[①],仍然会有“不断的发展”[②],由此可见,虽然毛认为共产主义仍然是理想社会和人类的光明前途,但这时他所塑造的共产主义的形象却和延安时期的设想大不相同。延安时期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定型的永远太平和谐的社会,1955 年以后则预料那种社会会继续有发展,仍然有矛盾和斗争,要随着时间的不停前进而经历“许多阶段和许多革命”[③]。

大 跃 进

“不断革命”的理论是在 1958 年初提出的,当时中国正要发动大跃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是另一次革命。毛希望通过大跃进使中国由不发达状态达到现代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为什么毛泽东竟然认为能够通过大跃进实现这样一种雄心?第一,毛认为,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有可能使生产力“跃进”。而且,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需要很多投资,基本上只涉及在生产上和思想意识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苏联的发展模式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建立工业基础,中国缺乏资金,但人力资源丰富,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并提高其思想觉悟,仍然能够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第二,毛泽东认为,大跃进是通过另一条道路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不能过分依靠发展大型工业企业的苏联模式,而要比较均衡地利用中小企业。这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比较合理地利用

① 陈志让编《毛泽东文集和书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62—63 页。
② 毛泽东《苏联经济学批判》(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57—58 页。
② 毛泽东:《苏联经济学批判》(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71 页。

人力资源，因为企业可以分散设置在劳动力丰富的地区。二是可以培养广大工人，使他们掌握现代工业的技术。三是通过下放工业企业可以更好地调动起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四是建立中小企业比建立大型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少。这种创造性的政策被称为“ 两条腿走路 ”。

第三，毛泽东新的经济战略方针强调自力更生，尽量利用低级或中级企业，而不是强调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高技术。中国还没有在一切生产领域都利用高技术的经济实力。所以必须采用低技术和高劳力投入相结合的方针，通过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使经济获得迅速发展。

毛的马克思主义和“ 文化大革命 ”

前已谈到，观察矛盾是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社会上出现的矛盾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种，如果处理不当，非对抗性矛盾完全有可能变成对抗性矛盾。由于中国人民的阶级属性不一，中国始终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矛盾发展到对抗，就需要通过暴力斗争加以解决。

以矛盾论为理论基础的‘ 不断革命 ’论,也是一种历史发展观，这种历史发展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仍然会经历一些剧变和革命斗争的时期。

毛泽东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观点使他容易具有这样一种看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旦出现新的挑战和矛盾，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斗争。此外，在毛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还有以下两个特殊因素促使毛认为，若不使中国革命的大目标变得模糊起来，一场具有革命性质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第一，毛泽东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功能有其独到的看法。毛认

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上层建筑是一个重要的甚至生死攸关的领域。思想领域的斗争和过去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同。他指出:

> 社会经济制度改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①.

第二,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正在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毛在60年代初开始关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问题。在1962年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断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②。1964年4月,他对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说,中共党内有许多这样的'新资产阶级分子'③ (这是出于毛泽东当时对党内一些思想认识分歧的错误理解和对于形势的脱离实际的估计——译者)。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见解,是同他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观点密切相关的。毛有这些思想,再加上他持'不断革命'论,就使他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进行革命,但'继续革命'论并非毛本人所提出,乃是支持他的一些过激分子(即毛逝世以后所说的'四人帮')所精心拟制,并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过激政策的理论根据。

在同苏联论战的背景下,毛泽东曾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和平演变"

①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1967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② 施拉姆:《未加修饰的毛泽东》第168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第488页。在第424页,毛还说,资产阶级会重新出现,这就是苏联现在所发生的情况。

为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毛不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定是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现在看出社会主义的前途将充满一系列极大的斗争，还说不定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毛指出“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他要求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①。

在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和行动受到直率的责备，说他忽视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因而导致中国陷入 10 年内乱。还对毛在 50 年代末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出苛评，认为他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只有毛在 1949 年以前中国革命和 50 年代初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才受到完全的赞扬。

不管人们对六中全会的评价同意与否，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就是毛泽东是 20 世纪一位最令人赞叹的马克思主义伟人。他既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问题而又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的发展，显然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①转引自《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 年 5 月 18 日），见于 196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毛泽东的思想

——以大跃进时期为中心*

〔日〕近藤邦康著　韩凤琴译

前　言

(1)我想一面连贯起来研究毛泽东的全部思想,一面考察革命成功和建设受挫的原因。这里,对革命只作简单涉及,重点是放在建设,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上。

一般认为毛泽东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中,有几对相对抗的两极,通过坚韧的自我维持矛盾,一面剧烈摇摆,一面前进。"人民与国家"就是这种两极中的一对,相当于传统思想的"天下与王朝"。毛泽东通过人民的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推进经济建设,批判了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一条腿走路"方式,创造了把"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同"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方式。

(2)《毛泽东选集》,在建国初期,被确立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意识形态(国教)的教科书,是选取部分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章,经过加工、修改制作成的教科书。它是被当作真理给绝对化了,并要求人们学习和实践的教义,是"经书"。要研究毛泽东

* 本文译自日本现代中国学会 1995 年发行的《现代中国》杂志第 69 号。作者近藤邦康系大东文化大学教授。

的革命思想，需要尽量查看当时发表的原文。

关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毛生前公开发表的文章非常少。1977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奠定华国锋政权的理论基础，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中心，将 1949 年至 1957 年的文章编辑而成的，一般认为还是作了一些加工和修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 1987 年以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校订严密，似乎没有经过加工和修改，但是由于他们采取了不收录未经毛本人亲自‘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的方针，所以许多重要讲话不是全文，只收录了‘提纲’。现在我们已收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1959 年)。此外，‘文化大革命’时期流入日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 5 种，在美国收集的《学习文选》等 15 种(其中一种是 1983 年出版的)作为参考，但校订不严密，有擅自删节、省略之处。

这样，要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资料方面困难很大。我想在把毛泽东的思想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尽可能地从毛自己的言论中抽出他的思想再进行全面研究。

(3)把毛泽东的思想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将它作为‘救亡——民主’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之一进行研究。即旨在把“经”还原成‘史’，把学习转变为研究。

作为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而开展的毛泽东研究，在日本，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西顺藏的论文是重要的。

西顺藏注意到中国革命中的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发表的看法是：毛泽东通过对敌斗争(敌我矛盾)和对客观情况的主观认识(主客矛盾)，意识到在集体中形成了个人的主体性，存在着主体(即人民的解放运动)和领导者(即共产党的服务与领导)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团结之间的

矛盾，并尽力去解决①。

西顺藏又对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释如下：为解决敌我矛盾而提出的团结与强制，有可能优越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自由与民主化；对一致、团结同不一致、自由之间的矛盾，出现企图从一致的方面出发，通过让思想服从于政治权力来解决矛盾的现象；人民的自发性、自觉与自觉的能动性是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动力，共产党的活动，在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民主)的同时,统一领导人民(集中)因为解决民主和集中的矛盾，必须由共产党方面进行，所以要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提倡领导人的思想改造②。这篇论文是在尽力理解中国的形势，但可以推测出作者对于其中难以理解的方面充满担心和苦恼。

80 年代,中国人把 50 年代至 60 年代在日本由西顺藏研究的集体与个人的问题作为“救亡与启蒙”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了启蒙’的问题。

五四运动,是‘启蒙’即新文化运动(文化、反封建主义、个人主义)和‘救亡’即反帝爱国运动(政治、反帝、集体主义)相互促进的。在革命战争中,‘救亡’的集体主义,压倒并否定了‘启蒙’的个人主义,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效果的。建国后,由于战时的方法被用于平时，所以造成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中,使‘文化大革命’的封建传统全面复活。毛泽东逝世后,提出人道主义和反封建‘启蒙’是正确的,但靠它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谋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和对传统的创造性的改变。

① 西顺藏:《毛泽东——〈实践论〉及他的人生观》,1966 年 4 月,选自《中国思想论集》,筑摩书房,1969 年版。

② 西顺藏：《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关的二三个问题》,1958 年 7 月,选自《中国思想论集》,筑摩书房,1969 年版。

与此相反,金冲及反驳说‘救亡唤起了启蒙’,强调了‘救亡’即集体意识和启蒙即个人积极性的结合，以及作为团结人民大众的核心的共产党的作用。丁守和肯定了金冲及的说法，在此基础上，也想尽量吸收李泽厚的看法。

根据上述日中两国的情况,我想从‘救亡与民主’这个角度来研究毛泽东。

此外,在中国人当中,我还特别参考了共产党的老干部薄一波和李锐的回忆录 党的理论家胡绳、廖盖隆、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李君如 军事理论家丛进、王年一 知识分子萧延中、杨奎松等人的研究。但是,他们都受到 1981 年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严格框架的束缚。我尊重那个框架,同时还想把框架本身也作为研究的对象，使其相对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救亡——民主’

(4) 毛泽东继承并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近代的课题，即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来侵略的抵抗和对国内专制的改革，尤其是 1895 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译注)失败后,严复提出了‘救亡——民主’的框架。

毛泽东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持续地渗透到以后的农民运动、苏维埃革命等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对革命主体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即,可以认为‘精神的个人主义’发展为‘主观能动性’‘民众的大联合’发展为‘群众路线’‘列宁主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中国近代最大的‘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使农民革命战争发展为民族革命战争，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他们努力做到：把日本与中国的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通

过武装斗争和持久战加以解决；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阶级矛盾作为次要矛盾,通过统一战线与民主加以解决 加强党的建设,对期待成为人民大众的斗争核心的共产党员,进行革命哲学教育,培养“大公无私”的道德和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能力。毛泽东的思想活动,在抗日战争中,似乎更加充实,更加富有创造性,能够保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平衡。

二、社会主义改造:“世界战争——国家社会主义与人民战争态势”

(5)毛泽东与共产党,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同美国和蒋介石对峙,防备世界战争,采取人民战争态势。与此同时,从朝鲜战争停战前后起,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即急忙引进新的总体战体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看出这是近代的“救亡”课题的继续。

中国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 9 章至第 12 章为唯一的蓝图,构筑国家社会主义的骨架,即 共产党与国家紧密结合起来，对社会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党与国家和社会团体一体化的集权政治 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与计划经济 马列主义的国教化。同时,通过农业集体化,进行原始积累,推进高速工业化,依靠党内斗争处理分歧意见。中国接受了斯大林的这种建设方式。但是,毛泽东在运用苏联的模式时，试图活用中国的人民战争方法。

(6)毛泽东于 1955 年 7 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作出结论说,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对抗,即人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大多数贫困的贫下中农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少数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倾向的对立。而且,批评共产党的农村工作部站到了少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他们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涨的群众运动加以指导,推进合作化。可以说,这是把农村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的阶级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把要求革命党站在贫农一边而不是站在地主一边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革命理论,重新作为建设的理论。

以毛的报告为起点,农业合作化迅速展开,同时又进行了手工业和工商业的改造。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

三、社会主义建设: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

(7)1956 年至 1957 年,毛泽东针对国内外新的事态发展,即国外在苏共二十大上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摸索出一套处理方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论十大关系"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富有创造性的新理论。然而,当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时,人们的反应很强烈,产生了超过毛的预想的过火行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背离,不得不经历摆脱挫折和困境这一恶战苦斗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在 1956 年初描绘出一种乐观的展望:在防备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同时,争取 12 年的和平时间,通过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其发挥专业技能,推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另外,在受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冲击后,提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为了克服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开展了整风运动,并要求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给予批评(开门整风)。然而,由于超出预想的激烈批评不断出现,所以又改为反右派斗争予以反击。其结果,知识分子畏缩了,丧失了积极性,在共产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